



# 孙家鼐

## 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

余音著

他是咸丰状元，晚清四朝元老，光绪皇帝师傅，武英殿大学士；  
他是创办、保护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第一功臣；  
他是中国师范、医学、政法教育的倡导者，民族工商业的先驱；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部长、最后一位“文正”；  
他的弟子还有辛亥元勋孙毓筠、柏文蔚，中共创始人陈独秀；  
他曾经被贬低、忽视，今天，他作为中国改革家的楷模横空出世……


 人民出版社



# 孙家鼐

## 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

余音\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文字编辑:冯 峰

装帧设计:朱 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余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  
ISBN 978-7-01-007224-1

I. 孙… II. 余… III. 京师大学堂-史料 IV. 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1364 号

## 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

SUNJIANAI CHUANGBAN JINGSHI DAXUETANG FENGYUN

余 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7224-1 定价:39.8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试论孙家鼐的七大历史性贡献

——在大连北大校友会纪念北大创建110周年大会上的演讲

(代序)

(2008年5月3日)

在晚清史、中国近代教育史，特别是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由于种种原因，晚清重臣、开明政治家、著名教育家孙家鼐一直鲜有人问津，其历史性贡献，更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正如李振东在《北大的校长们》中指出的那样：“在维新人物中，孙家鼐常被忽视，或者被误认为‘帝党’中的思想保守的‘右派’。其实，孙家鼐是当时统治阶级特别是高级官吏中爱国、开明并对维新运动做出过一定贡献的历史人物，他的作用和功绩不可忽略。”<sup>〔1〕</sup>在纪念戊戌变法暨京师大学堂创建110周年之际，笔者怀着重估历史、缅怀先贤的心情，特撰此文，希望拂去岁月的尘埃，让孙家鼐的功绩大白天下；也希望抛砖引玉，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孙家鼐（1827—1909），寿州人（今安徽寿县）。字燮臣。咸丰状元。同治七年，奉旨在上书房行走；光绪四年，奉旨任毓庆宫行走，担任皇帝师傅。历任工部、户部、吏部、礼部等部尚书。1898年7月，担任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也称管学大臣）、协办大学士，创办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夭折后，慈禧企图废除光绪皇位，朝臣多阿附，唯独他坚决反对。不久，他以病为由辞去官职，以示抗争。庚子国变发生后，他诀别家乡，抱病北上，共赴国难。1904年，任学务大臣，参与“新政”。1907年，任武英殿大学士，为资政院两总裁之一。1908年赏太子太傅。1909年病逝，谥号文正。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教育部长、最后一个拥有文正谥号者。经过深入

研究，我认为，孙家鼐主要有七大历史性贡献：

### 一、殚精竭虑，培养了一位富有维新思想的明君

清朝第十一位皇帝载湫，是醇亲王奕譞的儿子，也是清朝第一位非皇子而入继大统的皇帝。他4岁登极，在位34年，享年38岁。年号光绪。俗称光绪皇帝。奕譞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其妻是慈禧的亲妹妹。所以，光绪可以喊慈禧太后“大姨”，也可以喊他“大婶”。但是，为了施行精神控制，从光绪进宫那天起，权欲超人的慈禧就命令他喊自己“亲爸爸”，而且，终生未让他再见生母一面。中国古代是一个宗法社会，讲究“三纲五伦”，“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涵盖了人的天伦之乐。在光绪身上，“五伦”是很不完整的。所以说，光绪的宫廷生活非常痛苦。在痛苦的生活中，只有老师能给他带来一些人间温暖。

按照清朝皇室的规定，皇子6岁上学。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开始在毓庆宫上学，这一年他虚岁是6岁，足岁只有4岁半。直到光绪二十三年正月，毓庆宫被慈禧下令裁撤，光绪的汉师傅有好几个，如翁同龢、夏同善、孙家鼐、孙诒经、张家襄等，另外还有御前大臣，主要教他学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陪伴光绪时间最久、也最为他信任的老师只有两个：翁同龢、孙家鼐。由于翁同龢在戊戌变法开始才4天，就被罢官赶回原籍。所以，孙家鼐陪伴了光绪一生，并白发人送黑发人，为他送终。

光绪读书很用功，连慈禧都夸赞他：“实在好学，坐、立、卧皆诵书及诗。”在培养光绪皇帝的维新思想上，孙家鼐与翁同龢一样，起到了巨大作用。

例证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年），郑观应完成了维新巨著《盛世危言》。1896年9月，他委托陈炽转送孙家鼐一部新增订的《盛世危言》、书信及《时事急务条陈》、日本《教育法规类钞》<sup>[2]</sup>等。孙家鼐也两次在光绪面前高度评价《盛世危言》。光绪深表赞许，命令总理衙门印2000部，发

给大臣学习、研究。

例证之二，光绪二十一年九月（1895年10月），李提摩太到达北京，专门拜访了李鸿章、翁同龢、孙家鼐等人，广泛宣传变法主张。他特意请孙家鼐帮忙，将自己的著作《现代教育》等呈送皇上。李提摩太对孙家鼐印象深刻。他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说：“改革维新派强学会得到了总署大臣翁同龢与皇帝的师傅孙家鼐的同情和支持”，我“接受了李鸿章总督的建议，我像跟皇帝本人谈话一样与他（指孙家鼐）交谈。……我发现，他是所有中国官员中最有教养、最具绅士风度的人之一。第一次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两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为皇上读我翻译的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sup>[3]</sup>

例证之三，1898年7月17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孙家鼐上了一道《请飭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曾回忆说：“臣昔侍从书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选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sup>[4]</sup>同事们也说，孙家鼐本人对《校邠庐抗议》更“有偏嗜，平日固不离左右”。<sup>[5]</sup>

## 二、对于变法，有理性的思考和具体的贡献

高拜石在《新编古春风楼琐记》里坦言：“（孙）家鼐持变法之说最早，所重在裕民生、通民隐，采西法以兴实业。”<sup>[6]</sup>事实正是如此。1895年8月，康有为发起成立强学会，孙家鼐不仅与李鸿藻、翁同龢等一同参加，而且在安徽会馆里帮助强学会解决了办公场所。1896年1月21日，强学会遭到弹劾时，“高阳（李鸿藻）赴陵差未回，常熟（翁同龢）嘿不一言，至有此事。次日，常熟见人推之两邸，而为诸人抱屈。阅数日，寿州（孙家鼐）言事无妨，上（光绪）已询彼（孙家鼐），力言其诬，且谓事实有益，上悔行之不当……”<sup>[7]</sup>后来，强学会以官书局的名义得以保留，孙家鼐被光绪任命为管理官书局大臣。

戊戌变法的帷幕拉开后，孙家鼐积极支持、多次建言献策。比如，五月二十九日（7月17日），他连上三折，对于促进维新大业健康发展意义深远。

第一件，向光绪皇帝上了一道《请严旨禁悖书折》，对断章取义搞著述、四处树敌的康梁派予以警示。孙家鼐写道：“臣阅读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臣以为，康有为书中，凡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应该明降谕旨，亟令删除，实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光绪当即降旨：“著孙家鼐传知康有为遵照”。

第二件，上了一道《请飭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臣观冯桂芬、汤寿潜、郑观应三人之书，以冯桂芬《抗议》为精密。……拟请飭下直隶总督刷印一二千部，交军机处，再请皇上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发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不可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孙家鼐的建议，可以说是一箭三雕：一是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进行思想发动；二是在朝廷重臣中大张旗鼓、光明正大地进行一次“火力侦察”，借“加签”了解每个人对变法的真实想法，为光绪皇帝选贤任能提供参考；三是广开言路，让大家借“简明论说”为变法事业献计献策。光绪当即降旨：“荣禄迅即飭令刷印一千部，克日送交军机处，毋稍迟延。”8月1日，又令将《校邠庐抗议》发各衙门加签。戊戌变法夭折时，慈禧下令清理光绪宫中的新政档案，对孙家鼐的此举“深为不悦”，“慈圣闻之，微愠云：‘不意孙家鼐亦附和。’外间揣测，以为公将得罪。”〔8〕

第三件，上了一道《请先行指派官房开办大学堂片》。他认为，以当时的财力、办事效率和新旧对峙，建设一座“规模宏远”的京师大学堂，一时半会难以实现。夜长难免梦多。不如因时制宜，利用闲置的公房把大学堂先办起来，生米做成熟饭，然后再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完善。光绪甚为欣赏，当即下令：“著（总署王大臣）奕劻、（礼部尚书）许应骙迅即查照办

理。”六月初二（7月20日），奕劻、许应骙上了一道《请将地安门内马神庙空闲府第修葺作为太学堂之所折》，光绪当即批准。于是，大学堂基建工程得以开工兴建。

同时，他针对光绪皇帝在康梁等人的“大变、快变、早变”的激进理论误导下，“流星雨”似的颁布诏书，出现了急于求成的问题，孙家鼐忧心忡忡地提醒道：“变法自强，宜统筹全局，分别轻重缓急，谋定后动。比如人患痿痹之症，宜审周身脉络，次第施治，自能日起有功。否则，急求愈病，药饵杂投，病未去而元气伤，非医之良者。”（《请飭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希望引起重视，但光绪皇帝就像一匹高速奔跑的烈马，已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孙家鼐也是深感无奈。

### 三、创立新型的教育体系，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转轨

晚清教育，由于教学内容基本上都是“四书五经”，教育方法是死记硬背，教育目标是考取功名。所以，清廷官吏“不学兵旅而掌兵，不懂会计而掌财，见洋人栗栗变色”（梁启超：《知耻会序》），“以中国民众万万，其为士者十数万，而人才乏绝，至于如此。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尽也。”（康有为：《奏请推广学校折》）“国学”教育已经穷途末路。为此，很多人相继提出了尖锐批评，希望“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郑观应：《盛世危言》）

作为科举骄子，又多次担任乡试、会试主考官，孙家鼐不仅对“国学”教育的弊端认识深刻，而且，对于洋务运动的教育模式也提出了严肃批评。光绪二十二年七月（1896年8月），他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指出：“泰西各国，近今数十载，人才辈出，国势骤兴，学校遍于国中，威力行于海外，其都城之所设大学堂，规模阔整，教习以数百计，生徒以数万计……遂以争雄竞长，凌抗中朝，莘莘群才，取之宫中而皆备，非仅恃船坚炮利为也。”“独是中国京师建立学堂，为各国通商以来仅有之创举，苟仅援前此官学义学之例，师徒授受以经义帖括，猎取科名，亦复何裨大局？即



如总署、同文馆、各省广方言馆之式，斤斤于文字语言，充其量不过得数十翻译人才而止。福建之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学堂及南北洋水师武备各学堂，皆囿于一才一艺……此中国旧设之学堂，不能仿照办理也。”1898年7月3日，孙家鼐出任管学大臣，肩负变法重任，“是时管学大臣之权限，不专管理京师大学堂，并节制各省所设之学堂。实以大学校长兼全国教育部长之职权。”（《清史稿·志二十八》）作为大学校长，他要创办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作为首任教育部长，他还要管理各地新式学堂，构建新的教育体系。于是，孙家鼐“每日会集办事各员，公同核议，虽不在学堂办事之人，亦多方咨访，广集众思。总期受以虚心，任以实心，持以公心，矢以诚心，博取众长，折衷一是”。他顺应时代潮流，在汲取各方面智慧的基础上，对中国国学教育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推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促进了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的接轨。

六月十七日（8月4日），孙家鼐在《议覆五城建立小学堂疏》中说：“近年刑部候补主事张元济、户部候补郎中王宗基皆自行筹费创立学堂，肄业者颇称踊跃。……至顺天府地方，臣原有设立小学堂之意……”光绪当即下谕：“京师现已设立大学堂，其京外学堂亦应及时创立，俾京外举贡生监等一体入学，广为造就，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

六月二十二日（8月9日），孙家鼐在《奏覆筹办大学堂情形折》中建议：“进士、举人出身之京官，拟立仕学院也。……其入学者，专为习西学而来，宜听其习西学之专门。”教习对于仕学生采用的“互相讨论，坐而论道”，其设置规格、教学方法，有些类似于现在的研究生教育。

七月初五日（8月21日），他上了《奏覆须多设中小学堂折》：“开办大学堂，必须多办中学堂、小学堂，以便取材。”“皇上垂意大学堂，将以造就通达时务之才，而大学堂肄业必由中学小学以次而升。”所以，他建议多设中小学堂。

八月初四日（9月19日），孙家鼐连上数奏，即请奖杨锐等设立蜀学堂折，与顺天府尹胡燏棻联名请在顺天设立中学堂折，请皇上飭令内务府将地

## 试论孙家鼐的七大历史性贡献

安门外兵将局抄产官房拨款给顺天府设立中学堂，并准予在顺天府属各州县选拔学生就学，以“广育人才”。

十一月二十七日（1899年1月8日），他根据《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二节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咨行各省送交学堂章程等文中称：“……现在京师大学堂业已开办。各省会暨外府州县，所有已设之学堂，均须将学堂章程、教习姓名、学生额数咨送本大学堂，以便核考……”<sup>〔9〕</sup>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孙家鼐又担任了清廷新设立的首位学务大臣，成为名副其实的教育部长。“当时学部没有设立直省，各种学风庞杂，自从孙家鼐管理学部后，裁度规章，折衷中外，严定宗旨，一以敦行实学为主，海内学风，为之一靖。”<sup>〔10〕</sup>

由此可见，孙家鼐为创建新型的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研究生院（时称仕学院）教育体系，培养复合型人才，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 四、创办京师大学堂，捍卫变法成果

北大学子、教授许德珩在《北京大学校史·序》中指出：“京师大学堂本身就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是维新派克服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和反对才创立起来的。”这一论断，是非常切合实际的。

创建京师大学堂的动议，好多人曾提了好多年；在戊戌变法前两年，光绪还专门下谕，要求孙家鼐筹办。但是，由于阻力较大、经费不足、时机未到等原因，迟迟没有付诸实施。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是宣布变法，并将创建京师大学堂写进了《明定国是诏》中。于是，京师大学堂作为“天字第一号”工程正式上马。据统计，在103天的变法时段内，光绪皇帝“令如流水”“书朝上而电夕下”，连续颁布230多道除旧布新的上谕，事关京师大学堂的竟有15道之多，而且大都是当天奏报，当天拍板。可见光绪对创建京师大学堂的重视程度。9月21日，慈禧太后收回了赋予光绪的所有事权，戊戌变法夭折了。慈禧太后“罢新法，悉复旧制”，刚毅、徐桐等人坚决要求取缔尚在腹中的京师大学堂，但是，12月31

日，也就是戊戌事变100天后，京师大学堂却正式开学了。在“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奥秘何在？经过考证，我在《京师大学堂幸存之谜新解》一文中大胆推测，这是由于孙家鼐出于巩固维新成果、推进民族进步的思考，甘冒血风腥雨，不顾身家性命，动员丁韪良出面，以“外洋各教习均已延订，势难中止”“所以不能径废”<sup>〔11〕</sup>“查禁大学堂，将会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等理由，游说开明政客荣禄，荣禄进而说服了慈禧，因此网开一面，使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

京师大学堂的幸存，意义重大。罗筠筠在《教育改革乃强国之本》中指出：“由于他（孙家鼐）在政界与学术界的威望，他一手筹办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sup>〔12〕</sup>

先有京师大学堂，后有北大美名扬。如果没有京师大学堂这个基础，北大是否会诞生、是否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挥急先锋的作用，是需要打问号的。而且，京师大学堂的幸存，不单是一个北大的问题，因为，京师大学堂作为基础和摇篮，还“摇出”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医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多所名牌高校，如果把与京师大学堂有渊源关系的高校排列出来，其数量、质量都是惊人的。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医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还是在孙家鼐领导或鼓吹下创建的。

## 五、眼界高远，开了“兼容并包”教育思想的先河

思想自由、百家争鸣，是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灿烂辉煌的基石。但是，自西汉以来，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被统治阶级所采纳，学生们学的大多是汉代以前的《四书五经》，陈芝麻烂谷子，“诸生往往皓首而不能穷”（孙家鼐），消磨了多少代人的大好年华？此后，中华文明步入了一条“死胡同”，思想被禁锢，智慧被压抑，就像一个长期吃偏食的孩子，越来越发育不良，智商和综合素质大受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屡战屡败，丧权辱国，病根就在于此。

戊戌变法期间，康梁派出于私欲，利用所把持的编译局编写教材的机

会，任意篡改经典、排除异己学说，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针对这一问题，孙家鼐在《奏覆筹办大学堂情形折》中明确提出批评：“若以一人之私见，任意删节割裂经文，士论必多不服。”他还以史为鉴，对“学霸”作风予以痛斥：“昔宋王安石变法，创立三经新义，颁行学官，卒以祸。宋南渡后旋即废斥，至今学者犹垢病其书，可为殷鉴。”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盖学问乃天下万世之公理，必不可以一家之学而范围天下”的教育思想。或许可以这么理解，1916年12月，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正是对孙家鼐“学问不可以一家之学而范围天下”教育思想的直接传承和发扬光大。

为了做到学以致用、专才专用，孙家鼐还建议朝廷采取长效措施，使“学政治者归吏部，学商务、矿务者归户部，学法律者归刑部，学兵制者归兵部及水陆军营，学制造者归工部及各制造局，学语言、文字、公法者归总署及使馆参随，终身迁移不出本衙门”。这些思想，至今也未过时。

## 六、倡开官报，并提倡自由办报

报纸，是世界近代化的产物。中国的报纸，是西方的舶来品。古代，中国也有邸报、“朝报”、“邸抄”、“进奏院状”、“状报”等，但是，它们还不具备报纸的新闻特征，因为它们的任务主要是刊发诏书命令、皇帝的起居言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公报，而不是进行思想、信息交流。

1896年1月12日，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强学报》创刊，为了这张报纸，两江总督张之洞拿出1500两白银作为开办费。不久，强学会受到弹劾被查封。黄遵宪又联合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利用办《强学报》剩下的1200两白银创办了《时务报》，在张之洞的大力支持下，《时务报》风靡一时。

1898年7月，变法进入到关键性阶段，康梁等人喊出了“新旧水火不容”、“变也变，不变也变”等激进口号，并提出了“弃旧京”“营新都于江南”和“断发、易服、改元”等激进主张，一时间，人心浮动，天怒人怨，使得一直支持康梁变法的张之洞、陈宝箴等人都站了出来，表示反对。

康党陷入了空前的困境。

另一方面，维新派又发生了《时务报》内耗战，康梁与汪康年互相攻击，阵角大乱。为了夺得《时务报》大权，降服汪康年，康有为代御使宋伯鲁起草了一份《请改〈时务报〉为官报折》，希望借刀杀人。见到奏折，光绪一时拿不准，让孙家鼐“议覆”。7月15日，孙家鼐向皇上报告了自己的研究结果：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通达下情而可臻上理者。“泰西报馆林立，人人阅报，其报能上达于君主，亦不间可知。”<sup>〔13〕</sup>为沟通民情起见，应开办官报。而且，只将《时务报》改为官报还不够，还应命令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地的督抚，将各地报纸呈送皇上御览。另外，当年总署在《章程》中要求报纸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只能翻译外国之事，“今新开报馆，既得随时进呈，牖陈利弊，将来官书局报亦请开除禁忌。”<sup>〔14〕</sup>实际上就是提倡言论自由、自由办报。这些思想，十分宝贵。孙家鼐在“议覆”中还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其目的有二：一是发挥康有为的维新宣传家的特长，让人尽其才；二是巧妙地把康有为撵出京城，以减少他的激进言行对变法产生负面作用。接到孙家鼐的“议覆”，光绪当即批准。

## 七、身先士卒，堪称民族工商业的先驱

戊戌维新进行了两个月，光绪皇帝突然发现，自己的上谕“出不了中南海”，即使发布出去，也是废纸一张，各地总督、巡抚等并不认真落实。光绪异常震怒，七月初十日（8月26日），他严旨切责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倘再藉词宕延，必定予以严惩。”<sup>〔15〕</sup>十一日，又严厉要求各督抚凡交查各件，皆须迅速具奏。政令不行，让身在局中的梁启超感慨万千：“自四月以来，明诏累下，举行新政，责成督抚，而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寡有能奉行诏书者。”<sup>〔16〕</sup>

相比之下，倒是师傅孙家鼐不顾年高体衰、百事缠身，积极践行维新举措。在认真履行管学大臣职责的同时，他还积极投身于振兴民族工商业的

实践中。1898年7月12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表示要“提挈工商”，以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不久，孙家鼐就与安阳巨绅马吉森等集资150万银元，创建了安阳广益纱厂。1903年开机生产，时有纱锭2.5万枚，工人2000余人，是中国近代纺织工业创业最早、规模最大的厂家之一。

1898年，在孙家鼐的支持、参与下，其侄孙孙多鑫、孙多森领衔在上海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机制面粉厂“阜丰面粉公司”，股金为30万两白银。1900年建成投产，后来，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能力曾位居远东第一，其经济实力比荣氏家族的面粉企业还要大。

在其他领域，孙家鼐及其家族也是贡献巨大。史料记载，孙家鼐及其家族投资的著名企业有中国银行、启新洋灰公司、北京自来水厂、井陘矿务局、滦州官矿公司等，孙家鼐堪称民族工商业的先行者。

孙家鼐为政清廉，开拓进取，求真务实，绵里藏针，受到了同代人的高度评价。1909年11月29日，孙家鼐死在任上，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邮传部长、学者杨士琦撰写的挽联，对其为人、学养、品格都做了生动的概括：“事上也敬，行己也恭，杖于朝，杖于乡，允矣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能为师，能为长，所谓大臣。”自宋代以后，“文正”便是朝廷对大臣死后的最高谥号（荣誉称号）。宋代，司马光、范仲淹等3人获得“文正”谥号；明代，获得“文正”谥号者仅2人。在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只有曾国藩、李鸿藻等8人获赠谥号“文正”。孙家鼐是清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享有“文正”殊荣的人。

当然，作为封建末期的官僚，孙家鼐也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比如，他的忠君思想浓重。在开议会问题上，曾担心“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因此不太赞同；他做事比较圆滑，比如在处理杨翠喜案件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等等。但瑕不掩瑜，孙家鼐的历史性贡献是十分宝贵的，对后人也有很大的启迪、借鉴价值。

## 注释

- [1] 李振东：《北大的校长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 [2] 郑观应：《上孙燮臣师相论出洋肄业生书》，《郑观应集》（下册），第190页。
- [3]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239页。
- [4] 孙家鼐：《请飭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430页。
- [5] 刘声木：《荃楚斋随笔·〈校邠庐抗议〉》，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40页。
- [6] 高拜石：《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 [7] 转引自刘高：《北京戊戌变法史》，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 [8] 刘体仁：《异辞录》卷三，上海书店，1984年版。
- [9]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
- [10] 汤一介编：《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京大学出版社，1898年版，第18页。
- [11] 《北京大学堂述闻》，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1898年12月6日），《国闻报》。
- [12] 汤一介编：《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 [13]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436页。
- [14] 转录自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
- [15] 《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第4164页。
- [16]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40页。

# 目 录

试论孙家鼐的七大历史性贡献（代序）	1
<b>第一章 山雨欲来</b>	<b>1</b>
一、戊戌年初老天爷欲哭无泪	4
二、一个“段子”暗藏杀机	6
三、皇上的心为何比黄连还要苦	10
四、满朝文武数寇公公最爷们	23
五、慈禧太后故意“让一步”	27
六、师徒状元品茗论英雄	34
<b>第二章 冤家聚“寿”</b>	<b>47</b>
七、“四大家族”寿州大对决	49
八、意外发现财宝之后	54
九、被老天爷“罚背十年书”？	57
十、一副妙联点状元	63
十一、“中国成语城”	70
十二、竟是李鸿章惹的祸	74
十三、“我自横刀向天笑”	80
十四、中国近代军阀第一人	85
十五、树皮、草根、中药材都吃光了	91



十六、翁、李两家暗生芥蒂 .....	97
十七、“伤疤”常在国难时“发作” .....	103
<b>第三章 出身未捷</b> .....	<b>109</b>
十八、“三元会” .....	110
十九、李鸿章的难言之隐 .....	117
二十、贤良寺阴谋 .....	124
二十一、千古一怪“圣人为” .....	128
二十二、谁最先提出“设学堂” .....	133
二十三、最具绅士风度的京官 .....	139
二十四、太后画圈皇上跳 .....	142
二十五、翁中堂抹泪归故里 .....	146
<b>第四章 明争暗斗</b> .....	<b>157</b>
二十六、维新第一仗 .....	158
二十七、众望所归的管学大臣 .....	164
二十八、李鸿章推荐总教习 .....	170
二十九、康党为何众叛亲离? .....	179
三十、为维新连献“三计” .....	187
<b>第五章 力挽狂澜</b> .....	<b>195</b>
三十一、冲在维新实践第一线 .....	196
三十二、勇敢捍卫中国主权 .....	201
三十三、光绪的“舞步”越来越乱 .....	205
三十四、翁同龢死难瞑目 .....	213
三十五、谁无意间点燃了“导火索” .....	218